

言說之困境與家／國「冗餘者」： 論胡淑雯的白色恐怖書寫與政治批判

李淑君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本文探討胡淑雯的白色恐怖書寫，分為對體制與協力者的批判、訴說之必要與言說之困境、需要改造之人與家／國的「冗餘者」三小節進行討論。第一小節批判體制與協力者。提出體制的非法性、獎金的荒謬性、刑求的非人性；剷除記憶所繫之處；體制協力者與不同世代的歷史繼承者三部分。第二小節探討受難者訴說之必要與言說之困境。首先，政治精神病患失去證詞的有效性與無法言說包含兩個層次：一、無法為自己進行證言；二、其證言沒有人相信，使其無法成為見證者。此外，受困於語言的人經歷肉身凋零、語言被貶抑、精神失序、底層階級位置與無能言說下失去話語權。第三部分論述政治精神病患、政治遊民、政治孤兒成為需要改造之人與家／國「冗餘者」。政治精神病患在政治犯與精神病患成為雙重意義的需要矯正之人。精神病院與政治牢獄亦相互隱喻，兩者皆是刑求、網綁、打罵與電擊，影射了政治犯面臨的是一種精神改造；而精神病患面臨的是一場政治控制。政治犯與精神病患都是傅柯所言不吻合國家政治規範而「需要改造之人」。政治精神病患、政治遊民與政治孤兒則是受到政治、社會與家庭排除的「冗餘者」。政治犯為不符合國家主權秩序與邊界而成為「過剩者」；精神疾病者在「家」秩序外成為離家遊蕩、橫死街頭，為家／

國無法容納的「無用之人」；遊民與政治孤兒則因為政治災難而被社會棄置成為「冗餘者」。

關鍵字：胡淑雯、白色恐怖、創傷、失序、失語、冗餘者

The Dilemma of Speaking and the Redundant of Home/State: Hu Shu-wen's White-Terror Writing and Political Criticism

Li, Shu-Chun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Gender Studies,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u Shu-wen's White-Terror writing. The discuss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Firsts, Hu Shu-wen's White-Terror writing criticizes the system of authoritarian. Secondly, she points out the speaking dilemma of the survivors. Thirdly, the survivors become the redundant of home/country. In the first section, I analyze the state system and its cooperators. In the second section, I discuss the dilemma of speaking because of the trauma. In the third part, I discuss political mental patients; political nomads and political orphans become "the redundant" of families/countries, excluded by politics, society and family. In conclusion, political prisoners become "surplus" because they do not conform to the sovereign order and borders on the country. Some survivors with mental illness were wandering away from home, some dying

on the streets outside the “home”. Political orphans were abandoned by society and become “redundant” because of political disasters.

Key words: Hu Shu-wen, White-Terror, Trauma, Disorder, Aphasia, Redundancy

言說之困境與家／國「冗餘者」： 論胡淑雯的白色恐怖書寫 與政治批判*

一、前言：白色恐怖文學的發展

曾在「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擔任職務，亦為政治受難第三代的作家胡淑雯，其作品《哀艷是童年》(2011)¹、《太陽的血是黑的》(2011)²、《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2015)³、《字母 LETTER：胡淑雯專輯》(2018)⁴皆展現對白色恐怖議題的關注，並將政治敏銳度刻劃成文學作品。本文針對胡淑雯白色恐怖書寫進行細讀、互文的方式探討其白色恐怖書寫與政治批判。《哀艷是童年》中〈真相只有一種〉書寫政治受難第一代之困境；《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以報導文學書寫劉耀廷；《字母 LETTER：胡淑雯專輯》提及自身家族政治受難的過程；《太陽的血是黑的》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平庸之惡亦或有意為之？體制協力／協利亦或盡忠職守？論白色恐怖文學中「加害者」的複雜性與歷史之繼承」(計畫編號 MOST 108-2410-H-037-008-MY2)之部分成果，感謝科技部之經費支持。本文特別感謝匿名審查委員仔細、嚴謹且寶貴的意見，讓文章修改過程獲益良多。最後，感謝高師大博士陳麒文、高醫大學生范容瑛於擔任助理期間協助資料蒐集、格式校對、行政庶務等工作。

¹ 胡淑雯，《哀艷是童年》(台北：印刻，2006年)。

² 胡淑雯，《太陽的血是黑的》(新北：印刻，2011年)。

³ 呂蒼一、胡淑雯、陳宗延、楊美紅、羅毓嘉、林易澄著，《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新北：衛城，2015年)。

⁴ 丁名慶、陳蕙惠、楊凱麟、黃崇凱編，《字母 LETTER：胡淑雯專輯》(新北：衛城，2018年)。

貫穿整部作品的便是白色恐怖的失語、創傷與政治批判。胡淑雯於 2000 年後開始書寫白色恐怖議題，其作品與八〇年代政治小說有異同之處。其特殊之處首先將視角延伸到家族世代、精神創傷、受難家屬、歷史繼承者的思考。其次，著力為「歪七扭八」、「非常態」、「廢物與人渣」、「歪斜的人」等失序者進行塑像。其三，探討記憶與言說的重要性與不穩定性。本文以胡淑雯筆下白色恐怖書寫探討政治批判、世代創傷、精神失序、歷史繼承等內涵。

二二八書寫可推演至戰後初期。描述二二八事件作品便有丘平田（蘇新）的〈農村自衛隊〉⁵、呂赫若的〈冬夜〉⁶、伯子〈台灣島上的血與恨〉⁷、至八〇年代則有蕭颯《返鄉筭記》⁸、林雙不〈黃素小傳年〉⁹等作品。上述作品聚焦在二二八前後的社會混亂、對台灣命運的思索、戰後政治局勢之黑暗、人民的反抗、受難者家庭的處境等。當國民黨以「戡平共匪叛亂」下令「厲行全國總動員」¹⁰，1949 年再頒布《台灣省戒嚴令》，台灣在全球冷戰與國共戰爭「雙戰結構」下形成高壓的白色恐怖¹¹。直至 1991 年廢除《懲治叛亂條例》、1992 年修改刑法一百條為止，白色恐怖長達半世紀。書寫 1949 到 1992 年間白色恐怖作品豐碩，重要作家施明正、陳映真、李喬、林雙不、葉石濤、林文義等人從牢獄經驗、政治受難者處境、校園威權體制、社會主義理念等議題進行書寫，為反省與再思台灣威權政治重要的作品。八〇年代政治小說的興起也回應了社會變遷。陳建忠提及八〇年代末期、九〇年代初期不少回應歷史的小說「以自覺地、批判性地視角，對應著先前官方或威權版本的歷史敘事」¹²。台灣 1979 年美麗島事件、1980 年林宅血案、黨外組黨、解除戒嚴巨大的社會改變，小說家敏銳地參與了歷史的建

⁵ 丘平田（蘇新），〈農村自衛隊〉，《台灣文化》2 卷 1 期（1947 年 2 月 5 日），頁 14-17。收於許俊雅編，《無語的春天——二二八小說選》（台北：玉山社，2003 年），頁 43-51。

⁶ 呂赫若，〈冬夜〉，《台灣文化》2 卷 1 期（1947 年 2 月 5 日），頁 25-29。

⁷ 伯子，〈台灣島上的血與恨〉，收於許俊雅編，《無語的春天——二二八小說選》（台北：玉山社，2003 年），頁 53-77。

⁸ 蕭颯，《返鄉筭記》（台北：洪範，1987 年）。

⁹ 林雙不，〈黃素小傳年〉，收於施淑、高天生主編，《林雙不集》（台北：前衛，1992 年），頁 65-72。

¹⁰ 蘇瑞鏘，《白色恐怖在台灣：戰後台灣政治案件之處置》（新北：稻香，2014 年）。

¹¹ 藍博洲，《高雄二二八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民眾史》（高雄：春暉，1997 年）。

¹² 陳建忠，《記憶流域：台灣歷史書寫與記憶政治》（新北：南十字星文化工作室，2018 年），頁 38。

構，鬆動過往單一、官方的宏大敘述，因而出現不少對於政治反思的作品。本文認為上述關切白色恐怖議題的文本中，大致可以分成四類主題：

其一，控訴跟蹤、監視、吞噬人的白色恐怖威權。書寫體制參與者、情治人員、告密者等的盡忠職守、奉命行事、體制協力（協利）、執法過度等現象。如鄭清文《報馬仔》（1987）¹³、施明正〈指導官與我〉（1985）¹⁴、〈吃影子的人〉（1987）¹⁵、〈喝尿者〉（1983）¹⁶、葉石濤《台灣男子簡阿洵》（1990）¹⁷、鄭清文〈白色時代〉（1995）等¹⁸。上述作品呈現 1949 年全台實施戒嚴，禁止遊行請願、罷課、罷工、罷市、罷業，人權形同虛設的情境。作品也呈現了《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下，「匪諜嫌疑犯」被逮捕、搜索、羅織罪狀，以及人性扭曲的處境¹⁹。台灣在政治高壓之下，人們被網羅進黨、政、軍、警、特構成的國家機器權力網，除了身體的刑求之外，政治監控亦無所不在，面臨的正是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形容的「老大哥正在看著你」的時代²⁰。殷海光形容此時「島上無所不在的恐慌都有一種近乎非本能的反應」²¹，葉石濤提到「這種恐怖統治了所有日常生活，已達到食不知味、睡不知覺的地步」²²，皆為對體制批判與反思的作品。

其二，戒嚴時期教育場域不但是政治權力的延伸，更成為黨國思想監督、滲透的政治場域。擅長書寫校園政治的林雙不批判白色恐怖滲透、延伸到校園，如〈小喇叭手〉²³、〈大學女生莊南安〉²⁴。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將國家機器分為「壓制的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與「意識型態國家機器」

¹³ 鄭清文，《報馬仔》（台北：圓神，1987年）。

¹⁴ 施明正，〈指導官與我〉，《臺灣文藝》92期（1985年1月）。本文參考施明正，《施明正集》（台北：前衛，1993年），頁179-225。

¹⁵ 施明正，〈吃影子的人〉，《施明正短篇小說精選集》（台北：前衛，1987年），頁175-244。

¹⁶ 施明正，〈喝尿者〉，《施明正集》（台北：前衛，1993年），頁115-131。

¹⁷ 葉石濤，《台灣男子簡阿洵》（台北：草根，1994年）。

¹⁸ 鄭清文，《鄭清文短篇小說全集——白色時代》（台北：麥田，1998年），頁175-198。

¹⁹ 薛化元，《戰後台灣歷史閱覽》（新北：聯經，2015年），頁45-88。

²⁰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徐立妍譯，《一九八四》（台北：遠流，2012年）。

²¹ 殷海光著，盧倉譯，〈剖析國民黨〉，收於林正弘、潘光哲、簡明海編，《殷海光全集：政治與社會（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頁1358。

²² 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50年代》（台北：前衛，1991年），頁64。

²³ 林雙不，〈小喇叭手〉，《小喇叭手》（台北：前衛，1991年），頁173-222。

²⁴ 林雙不，《大學女生莊南安》（台北：前衛，1991年），頁159-185。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²⁵。政府、軍隊、警察實踐著國家機器中暴力與壓制的功能，以身體的懲罰作為一種政治手段；相對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則在意識型態取得霸權與支配性，進行文化思想上的監控。林雙不作品描述了教育體制如何成為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

其三，書寫白色恐怖下人性的扭曲。如李喬〈告密者〉(1982)²⁶、施明正〈渴死者〉(1981)、〈喝尿者〉(1983)以諷刺、批判、但悲憫的視角書寫人性扭曲²⁷。如〈喝尿者〉金門陳在獄中每天清晨喝著自己的尿象徵著贖罪、扭曲行為，以及威權體系與協力者彷彿劇作家、導演，編織出各式各樣的案例，讓人淪落至莫可奈何的情境。

其四，書寫受難者的苦難與理想性。此類作品從牢獄經驗、贖罪性格、政治苦難來書寫社會主義的理想性格，如陳映真〈山路〉(1983)²⁸、〈鈴璫花〉²⁹、〈趙南棟〉(1987)³⁰、〈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1994)³¹、劇本《春祭》³²、〈夜霧〉(2000)、藍博洲《藤纏樹》(2002)³³、《幌馬車之歌》(1991)³⁴、《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1994)³⁵、《老紅帽》(2010)³⁶、《紅色客家庄》(2004)³⁷、《紅色客家人》(2003)³⁸、《台共黨人的悲歌》(2012)³⁹、

²⁵ Althusser, Louis,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1), pp. 85-126.

²⁶ 李喬，《告密者》(台北：自立報系，1986年)。

²⁷ 同註16，頁169-178。

²⁸ 〈山路〉陳映真1983年7月14日作。陳映真，〈山路〉，《文季》1卷3期(1983年8月)。收於《陳映真作品集5》(台北：人間，1988年)。又收於陳映真，《陳映真小說集5》(台北：洪範，2001年)，頁51-91。

²⁹ 〈鈴璫花〉陳映真1983年3月20日作。陳映真，〈鈴璫花〉，《文季》1卷1期(1983年4月)。收入陳映真，《陳映真作品集5》(台北：人間，1988年)。又收入陳映真，《陳映真小說集5》(台北：洪範，2001年)，頁1-49。

³⁰ 陳映真，〈趙南棟〉，《人間》20期(1987年6月)。又收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87年6月，節錄為〈趙爾平〉。收入陳映真，《陳映真作品集5》(台北：人間，1988)。又收入陳映真，《陳映真小說集5》(台北：洪範，2001年)，頁93-202。

³¹ 陳映真，《陳映真小說集5》(台北：洪範，2001年)，頁203-262。

³² 陳映真，《春祭》(台北：行政院文建會，1995年)。

³³ 藍博洲，《藤纏樹》(台北：印刻，2002年)。

³⁴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出版，2004年)。

³⁵ 藍博洲，《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台北：時報出版，1994年)。

³⁶ 藍博洲，《老紅帽》(台北：南方家園文化出版，2010年)。

³⁷ 藍博洲，《紅色客家庄：大河底的政治風暴》(台北：印刻，2004年)。

³⁸ 藍博洲，《紅色客家人》(台中：晨星，2003年)。

³⁹ 藍博洲，《台共黨人的悲歌：張志忠、季滄與楊揚》(新北：台灣人民，2012年)。

《台灣好女人》(2001)⁴⁰、《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2017)⁴¹、《幌馬車之歌續曲》(2016)等⁴²，書寫了威權體系對左翼的壓制以及革命者的苦難與理念。

相較於上述四類書寫議題，胡淑雯的特殊性在於將視角延伸到跨世代創傷，突破先前創作者聚焦在受難第一代的思考。雖然陳映真〈山路〉、〈趙南棟〉、李昂的〈彩妝血祭〉⁴³、《迷園》⁴⁴也刻劃不同世代的政治受難者，然而陳映真多寄託堅忍贖罪與社會主義理念；李昂則以女性受難主體作為歷史見證者與保存者。不同於陳映真與李昂的書寫，胡淑雯筆下不同世代的受難者多精神受創、歪七扭八之人，無法證言之人。如紀大偉所言：「道盡台北繁華，但她的台北卻也充滿落伍者，瀕死者，無法加入資本主義浪潮的畸零人。」⁴⁵畸零人更彰顯記憶與言說的重要與不穩定性。此外，近幾年對於「加害者」有深刻的反思，花亦芬、吳乃德、葉虹靈提及「清理過往」必須對「加害系統進行反省」⁴⁶。曹欽榮也提出「沒有一個加害者被追究」是「失衡的轉型」⁴⁷。然而，加害／被害並非二元對立，胡淑雯的特殊性寫出協力權貴後代面對自身的艱難，以及受難者與協力者後代的情感連結。黃長玲形容胡淑雯作品充滿社會意識，卻不讓教條凌駕於寫作⁴⁸。其筆下的世代創傷、精神失序、歷史繼承複雜地呈現威權體制、創傷失序、失語與政治的社會意識。

⁴⁰ 藍博洲，《台灣好女人》，(台北：聯合文學，2001年)。

⁴¹ 藍博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新北：台灣人民，2017年)。

⁴²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續曲》(新北：印刻，2016年)

⁴³ 李昂，《北港香爐人人插：戴貞操帶的魔鬼系列》(台北：麥田，1997年)，頁163-220。

⁴⁴ 李昂，《迷園》(台北：麥田，2006年)。

⁴⁵ 紀大偉，〈資本主義，一個愛的故事——讀胡淑雯《太陽的血是黑的》〉，《印刻文學生活誌》7卷12期(2011年8月)，頁60-63。

⁴⁶ 葉虹靈，〈各國的轉型正義工作〉，收於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卷一·清理威權遺緒》(新北：衛城，2015年)，頁98。

⁴⁷ 曹欽榮，〈紀念博物館和轉型正義〉，收於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卷二·記憶歷史傷痕》(新北：衛城，2015年)，頁122。

⁴⁸ 黃長玲，〈誠實的騷動與書寫——胡淑雯印象〉，《文訊》第274期(2008年8月)，頁41-42。

二、白色恐怖文學書寫與研究

白色恐怖文學研究多針對個別作家如陳映真、藍博洲、葉石濤、施明正、郭松棻等進行政治贖罪、報導文學、監獄文學等議題進行研究⁴⁹。議題綜論的前行研究包含史峻《台灣白色恐怖創傷研究》探討政治創傷⁵⁰；王佩穎《戰後台灣小說的轉型正義實踐》以文學補遺歷史空缺的角度切入，從二二八作品到白色恐怖作品討論歷史見證⁵¹。黃文成則從監獄文學的框架與視角批判外來政權⁵²。王建國亦以監獄文學為主軸，分析政治文學綜觀的流變⁵³。湯舒雯則以葉石濤、陳映真、郭松棻、李渝四位作家「白色恐怖見證文學」的表現／癥候，探討「瘋癲」成為顛覆官方檔案的書寫方式⁵⁴。上述研究奠定了白色恐怖研究中監獄書寫、轉型正義、創傷研究不同議題面向。

胡淑雯的相關研究，辛佩青以茱莉亞·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的「象徵界」（the semiotic）與「符號界」（the semiotic）探析童年性經驗主題的〈浮血貓〉⁵⁵。沈沛湘從暴力敘事探討胡淑雯小說中的道德與暴力，提出瘋狂建構了女性主體的能動性與抵抗性⁵⁶。文學短論中，紀大偉從批判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視角點出胡淑雯書寫活在全球化資本主義陰影下被迫放棄尊嚴的人⁵⁷。張

⁴⁹ 相關研究包含：吳懷晨，〈快樂的罪行：陳映真救贖三部曲結構中的罪與聖〉，《中外文學》41卷1期（2012年3月），頁87-135。歐崇敬，〈「異鄉的存在」與「物化之虛無」的〈山路〉左翼政治思想〉，《思與言》45卷3期（2007年9月），頁23-56。各別作家的研究眾多，在此不一一列舉。

⁵⁰ 史峻，〈臺灣白色恐怖的創傷研究：一個奠基於「族裔反霸權主義敘述」的觀點〉（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

⁵¹ 王佩穎，〈戰後台灣小說的轉型正義實踐〉（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年）。

⁵² 黃文成，〈士的志與誌——柯旗化火燒島及其獄中書寫經驗〉，《通識研究集刊》第15期（2009年6月），頁77-95。黃文成，《關不住的繆思——臺灣監獄文學縱橫論》（台北：秀威資訊，2008年）。

⁵³ 王建國，〈百年牢騷：台灣政治監獄文學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6年）。

⁵⁴ 湯舒雯，〈史的暴力，詩的壟斷——台灣白色恐怖的文學見證、癥候閱讀與文化創傷〉（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

⁵⁵ 辛佩青，〈卑賤作祟／違——論胡淑雯小說〈浮血貓〉中階級、記憶與身體之議題〉，《輔大中研所學刊》第20期（2008年10月），頁185-201。

⁵⁶ 沈沛湘，〈從屈從到協商：台灣當代女性小說中的暴力敘事〉（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年）。

⁵⁷ 同註45。

悅然評論《太陽的血是黑的》是對「畸人」們的義診手記⁵⁸。上述精確地評論了胡淑雯的書寫特色，然而針對胡淑雯的討論，尚未針對政治創傷、歷史繼承、失序、失語進行深入討論。因此本文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深化政治創傷的議題，探討其作品對體制與協力者的批判為何？不同世代的創傷如何呈現？失序如何成為無效的證詞？政治犯與精神病患如何互文地成為需要改造之人？政治精神病患的家／國的「冗餘人」與「邊緣人」處境？歷史繼承者的處境與歷史關係？藉此探討世代創傷、記憶與言說的不穩定性、失語與失憶等內涵。

三、對體制與協力者的批判

(一) 體制的非法性、獎金的荒謬性、刑求的非人性

《太陽的血是黑的》全書共分 18 章，「各篇章為不同主題與主角，卻環環相扣」⁵⁹，從批判體制到描述格格不入的零餘者、精神病患、政治受難者。胡淑雯以時空今昔切換來對比安逸的今日與苦難的過往。〈來來飯店〉一章，描述戰後在郵務總局上班的 Cj，歷經戰後的通貨膨脹、血腥的 1947 年、親眼見到堂哥曝屍於車站，後於 1950 年代大逮捕時期被捕。Cj 的苦難與同房難友劉先生、羅先生、呂先生構成受難者圖像，藉以批判威權時期的體制。

胡淑雯批判體制的非法性、獎金制度的荒謬性、以及刑求的非人性三層次。首先，在直指體制的非法性上，胡淑雯寫到白色恐怖是「祕密逮捕，祕密刑問，祕密審判，祕密槍決。等於謀殺」的「非法」時代。林淑芬與薛熙平指出動員戡亂時期有一百五十多種違反憲法、侵害人權的法令，成為威權體制的「例外狀態」⁶⁰，且藉由懸置規則與法律來建立特殊專法（如戒嚴特殊法案）⁶¹。周婉窈指出國家體制是由一整套互相配合的制度（政府組織、軍隊、警察、司法、

⁵⁸ 張悅然，〈飛躍沒有圍牆的瘋人院〉，《印刻文學生活誌》7 卷 12 期（2011 年 8 月），頁 64-66。

⁵⁹ 洪明慧，〈寫作是我的勞動方式——訪胡淑雯〉，《幼獅文藝》第 650 期（2008 年 2 月），頁 70-71。

⁶⁰ 林淑芬，〈導讀〉，收於阿岡本（Giorgio Agamben）著，薛熙平譯，《例外狀態》（台北：麥田，2010 年），頁 7。

⁶¹ 同註 60，頁 51-156。

教育體制)以及身處在其中的人所運作⁶²。胡淑雯評論這套體制形成「祕密逮捕，祕密刑問，祕密審判，祕密槍決。等於謀殺」的年代。

其次，政府以獎金獎勵告密者，形構了台灣告密文化及獎金制度的荒謬性。〈來來飯店〉中同學為得到獎勵而告密，呼應過往白色恐怖時期告密文化。《懲治叛亂條例》的檢舉規定是一場人性試煉。一方面「知匪不報，與匪同罪」；另一方面以高額獎金誘惑人心。甚至構成「有些人為了獲得減刑，任意檢舉不相干的人」，造成社會互信的破壞⁶³。1950-1954年《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中，被檢舉人財產沒收後，有35%財產成為辦案人員獎金。1954年之後，被檢舉人財產沒入國庫，告密者與辦案人員另外給予獎金⁶⁴。此條例使得人可能為自身利益而成為體制協力者。李禎祥提及告密獎金是許多白色恐怖案件的觸媒，檢舉人與辦案人員就像中愛國獎卷一樣，可以在一夕間成為「平民百萬富翁」⁶⁵。〈來來飯店〉寫到政治受難者呂先生被判死刑之前，已經病死獄中，但「辦案的人不願撤案，為了在成案以後沒收呂的財產，領取三分之一的獎金」(《太陽的血是黑的》，頁66)。周婉窈認為當時的獎金制度，迫使告密、辦案文化成型。獎金制度具荒謬性外，胡淑雯更指出制度的扭曲與恐怖：「為了得到獎勵而趕盡殺絕，是一種恐怖；不為了獎勵依舊趕盡殺絕，是另一種恐怖。」(《太陽的血是黑的》，頁57)。

其三，在刑求的非人性上，Cj的難友呂先生「歷經一次大規模的精神崩潰、人格破產，消顏成沒有骨頭的人」，後病死獄中。Cj則同其他的犯人一樣，長期處於半飢餓的狀態、營養失調、雙腳腫痛、稍一走路就氣喘，且遭到刑求而被搗壞了腎臟、腺體、皮膚。刑求者「尤其討厭他的指甲，將它們一一拔光。自從許醫師在赴刑途中，沿著走道呼口號，後繼者在送刑之前一律被人拿破布塞住嘴巴，或者用槍托敲壞下巴。」(《太陽的血是黑的》，頁62)。損毀、虐待受難者的身體，為刑求的非人性。關押受難者的火燒島在胡淑雯筆下是一座

⁶² 周婉窈，《轉型正義之路：島嶼的過去與未來》(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2019年)，頁7。

⁶³ 黃承儀，〈戒嚴時期法律體制的未解難題與責任追究〉，收於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卷三·面對未境之業》(新北：衛城，2015年)，頁19-38。

⁶⁴ 同註63，頁47。

⁶⁵ 李禎祥，〈超級硬仗：追還財產〉，收於同註63，頁150。

圍困住理想、意志與青春的隔離島。若未被判刑的人「沒領到死刑，只判了十幾年，大家都互道恭喜，好像中獎一樣」（《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245-246）。顯示出威權時代下，刑求、病死、受虐的恐怖中，使活著成為是一種僥倖的荒謬性。

（二）記憶所繫之處：地景的剷除

胡淑雯詮釋著記憶的重要性與不穩定。記憶或遺忘，並非依賴個人的努力，而是集體社會如何型塑記憶。曹欽榮提到「過去」會「反覆地困擾著當代人面對過去的尷尬處境」，「直到對過去的尷尬記憶漸漸沉澱為歷史」⁶⁶，然而記憶必須有「所繫之處」，若剷除歷史地景，失去「所繫之處」，便形成失憶、失語與創傷。

〈來來飯店〉、〈西門町·獅子林·慾望街車〉描述白色恐怖幾十年後，過往侵犯人權之處成為欲望所在，因而「台北人在沉默中學會遺忘，遺忘大逮捕的恐怖。連監獄都洗去了血污，化身樂園般的大飯店。」（《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63）。軍法處成為大飯店；青島東路成為國家電影圖書館；日本人的陸軍倉庫被改做監獄，日後再賣給財團，改建來來香格里拉。日治時期的東本願寺則成為進行祕密偵訊、祕密處決的保安司令部保安處，今日成為獅子林大樓與來來百貨公司（《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135）。當李文心在來來飯店握著銀製的刀叉，在餐盤上處理一塊帶血的牛排，恍惚中彷彿聽見鐵鍊咬住清晨的聲音，於灰濛濛的曙色發出空蕩的回聲，磨過石版地。刀叉銀色的切割聲，扣住手銬鐵色的嗚咽……（《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52）。

此處對地景剷除的書寫很巧妙地互文電影《超級大國民》（1995）中空間的運用。《超級大國民》政治受難者許毅生從瞭望台眺望整個台北市，鏡頭從國父紀念堂、總統府拉到馬場町，曾流著許多青年的血的馬場町土地上，成了許多人「唱歌跳舞，滿面春風」的青年公園、過往／保安司令部成為今日／獅子林

⁶⁶ 曹欽榮，《自由遺產：台灣 228、白色恐怖紀念地故事》（台北：台灣游藝，2017 年），頁 17。

大樓，白色恐怖時期的警備總部軍法處、日治時期的陸軍倉庫則成為五星級的來來大飯店，今日「刀子叉子，鏗鏘鏘鏘的聲音」的飯店，卻是「五十年代，無數朋友被判生判死的地方」。〈西門町·獅子林·慾望街車〉呼應著消費娛樂場所被遺忘的過去：

獅子林大樓，連同來來百貨公司，加上六福大樓這片地，戰前本是一座寺廟，「淨土真宗東本願寺」，戰後被老 K 改作刑場，更名「保安司令部保安處」，特務管它叫大廟，民間暱稱閻羅殿。監獄一間三坪大，二十個犯人站著睡。秘密偵訊，秘密處決。臥龍街一帶另有分部，彷彿連鎖加盟店，把人逮進六張犁的山洞裡，刑求過當弄死了，就地掩埋荒草間（《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135）。

來來飯店（後喜來登飯店）曾經為軍法處監獄，擠滿政治犯、擁擠悶熱。在黎明前，鐵門鏗鏘一聲，「幾百顆心抽一下，跳上來，頂住喉嚨。點到名字的，送馬場町槍決」。曾為「政治犯批發中心」的台北，今日卻「刑場化身名利場」，社會集體剷除歷史，面向歡樂（《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64、135）。

當記憶所繫之處被剷除，新地景則覆蓋上當權者之名。體制協力者海爺爺的後代小海於解嚴 1987 年剛滿一歲，得知自己是協力者後代時，選擇記憶他不在場但祖父輩共謀的年代。在一次小海搭乘客運「探出窗外，發現車子正行駛在『中正路』上，反而無從判斷自己身在何處。也許在永和、中和，也許三重、新莊，也可能離開台北，到了桃園。全台灣的中正路，三一九個鄉鎮縣市，據說有一百七十條。」（《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108）。透過小海之眼，記憶所繫之處成為當權者權力象徵，「那空氣汙染一般無所不在的政治，最主要的目的正是製造遺忘，要我們忘記自己活在政治裡面，活在汙染當中」（《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137），地景被覆蓋如同記憶被覆蓋；地景消失如同記憶剝奪。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書寫紀念碑不但對抗遺忘，也讓哀悼有所繫之處。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認為倘若人失去了與歷史之間的延續性，原本延續過

去的城市的市街名字，便消失過去也失去名字⁶⁷。胡淑雯從地景的消失批判了當權者剷除歷史的情境。

（三）體制協力者與歷史繼承者

〈樂蒂〉一章透過底層、粗俗、話語無法進到權力核心的按摩女郎樂蒂，對比看似仙風道骨、話語在權力核心的體制協力者海爺爺。海爺爺於戒嚴時期在中央當官，官威有多大，警備總部就有多大。他天天按摩，「無所事事的生活養出一雙白嫩的手」，「皮膚細白像個吃軟飯的」，即使新社會到來繼續當貴族，到老依然領取高額年金，「吃定了別人的生活：老百姓的生活。海爺爺不習慣『大眾』與『人民』，『老百姓』才是他習慣的用語。」胡淑雯透過李文心之口評價：「可以嗅到海爺爺背後，那段臭不可聞的歷史」（《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72）。胡淑雯以白嫩、看似仙風道骨來描述海爺爺，反諷其優渥、貴族般的生活，並以馬場町的鮮血來對比既得利益者敗壞的血污：「原來腐敗的人流出的腐敗的血，看起來也是乾淨的一團熱血。卻截然不同於六十年前、流淌於馬場町的、理想主義的血。」（《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93）。海爺爺的後代小海與小光，便成為歷史優勢的繼承者。優勢如何被繼承呢？胡淑雯書寫體制協力者在辦案、領獎金、分贓沒收的財產時，不但享受榮華富貴也庇蔭後代的生活。周婉窈很精闢地指出協力者與繼承者的議題：

台灣白恐時期，很多權力核心的加害者（及其協力者）獲得非常豐厚的資源，不但自己享盡榮華富貴，還「蔭」及子孫。他們的子孫占據今天台灣政治、社會、文化、學術、傳媒、企業的上層，我們姑且稱他們為黨國後裔。他們通常是靠父祖打造出來的黨國人脈和政脈，取得超越競爭（不需競爭）的優勢。這些人當然無罪，就算他／她是手上沾了很多血的情治頭頭的後裔。不過，社會至少要了解他們是誰，為什麼呢？因為這些人今天站在各行各業的頂端，擁有超大權力，以及超強話語權，

⁶⁷ 米蘭·昆德拉 (Milan Kundera) 著，尉遲秀譯，《笑忘書》(台北：皇冠，2002 年)，頁 174。

他們必須了解自己的父祖在整個壓迫體系中的位置，做了哪些事情。只有當他們能面對這段過去，才有可能反省，才有可能不憑藉自己的權力和話語權，為過去的體制說話。⁶⁸

身為警備總部高官海爺爺享受榮華富貴，協力者後代的小海與小光也享著不知民間疾苦的生活。胡淑雯回應著當集體社會「不知道」過往會使得「含冤的歷史被商品的歡樂層層覆寫，掩埋」（《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139）小海不知情來來飯店前身為軍法處象徵第三代的失憶，但當小海知道自身是「接收者與劫收者的繼承人」，意識到自己家庭的優渥是建立在另一些家庭的悲劇上，最後選擇記憶過往。對於願意記憶的協力者後代，胡淑雯對協力者後代的思考：「學做台灣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106）學作台灣人，須如剝洋蔥層層剝去理解世代的歷史繼承。政治受難者第三代的李文心在學校參訪法務部調查局時，中途脫隊進入標本室而遇見死亡者的檔案，成為追尋記憶、企圖敘說、拒絕失語、追求「記得」的第三代。受難者後代與協力者後代在胡淑雯筆下是共同理解記憶、尋求訴說的可能性，產生抗拒失語的能動性。

四、訴說之必要與言說之困境

胡淑雯在《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提及白色恐怖重要命題是：對於記憶、失憶與失語的關切：「在種種關於受難與恐懼，避難與流離的敘事中，經常見到書信被銷毀的故事，有的害怕遭到清算，有的害怕牽連入獄，也有的，是為了逃避痛苦，選擇遺忘。」⁶⁹書信的銷毀也就是記憶的銷毀，因此記憶之首要必須正視、對待與訴說「不曾告人」的受難史。《太陽的血是黑的》回應了此命題。保加利亞作家卡內提（Elias Canetti）《得救的舌頭》中，一名男人跟男孩說：「伸出你的舌頭。」男孩照做。男人將刀鋒地貼在他的舌頭上，問：「把它割掉好不好？」胡淑雯數次以此隱喻舌頭被割掉，不能言說，

⁶⁸ 同註 62，頁 182。

⁶⁹ 胡淑雯，〈劉耀廷〉，收於同註 3，頁 126。

不敢書寫的處境⁷⁰。訴說的重要在於若被強迫遺忘或無法言說，創傷便無法得到真正的療癒。如〈阿莫·秋香〉中阿莫被父親要求忘記幼年被性侵的回憶而失語。創傷本身令阿莫痛苦，然而「不准說」這件事，更引發他的痛苦。創傷必須訴說與療癒，因為「傷口像一張不曾癒合的嘴巴，敞開著，該流的血還沒乾，化膿生瘡，喃喃欲訴，渴望讓人聽見：聽自己怎麼受的傷，哪裡還裂著，哪裡還痛。」（《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255）此處寫出苦難兩種層次：一次是苦難發生當下；另一次則是苦難被遺忘。「真相令人痛苦—沒錯，真相是個沒用的東西—眾人轉而譴責揭露真相的人，忘記追究加害者。」，且「沒說過就等於沒發生過，一如遠方的戰爭」（《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136-257）胡淑雯指出訴說與療癒；訴說與在場的關係。

苦難之所以被遺忘，在於沒有被訴說。《太陽的血是黑的》、《哀艷是童年》書寫了無法言說者：遊民、殘障者、同性戀、變性人、政治犯、底層階級、販賣皮肉的女性、遭到性侵害的童男幼女、精神病患政治犯。無法訴說的幾個層次：首先，說的話沒有人相信。各式各樣扭曲、創傷、社會規範的局外人是《變形記》中說話沒有人相信、失去話語權力的變形者與失語者。如被綁票的三歲小孩，是「口齒不清，還沒上學，是天生的文盲，天生的『失語患者』」。其次，失語者無人能懂，「想回答但是無法說話」、「癱瘓了語言」的人（《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153-171）。《太陽的血是黑的》再詮釋卡夫卡（Franz Kafka）《變形記》中裡最恐怖也最關鍵的一句：「這不是人說的話」隱喻即使言說也是無法被聽懂的失語狀態。《變形記》、《慾望街車》、《麥田捕手》中孤獨的命題融合在作品中，互文隱喻著失語者的孤獨⁷¹。《變形記》裡「最根本的變形，不是失去人形，而是失去話語」（《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20）：

⁷⁰ 筆者與胡淑雯於 2017 年 10 月 29 日共同擔任「政治暴力下的親密戰友——港台民主運動中的女性經驗」與談人，胡淑雯便提出卡內提《得救的舌頭》一書的觀點。亦可見蔡倩怡，〈胡淑雯：不是傷痕文學〉，（來源：<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e8%83%a1%e6%b7%91%e9%9b%af-%e5%af%ab%e4%bd%9c-%e5%8f%b0%e7%81%a3-7051>，2020 年 6 月 10 日）。

⁷¹ 駱以軍、胡淑雯，〈各式各樣孤獨所形成的暗影——駱以軍、胡淑雯對談〉，《印刻文學生活誌》7 卷 12 期（2011 年 8 月），頁 68-79。

這是卡夫卡式的，G 的孤獨。這樣的孤獨於我外公並不陌生，他是政治犯，無期徒刑，叛亂罪，實際服刑十五年。沒人願意聽他說話，沒有人把他當真，幾十年過去了，再也沒有誰聽得懂他。（《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20）

當時間延遲，老者凋零，有人想聽的時刻再也沒有人聽得懂，成為人無法理解的語言。胡淑雯作品中三世代故事，不同世代面對歷史與遺緒而有不同的失語與創傷。第一代在經歷刑求、隔絕、告密後瘋狂、凋零而無法言說者。第二代在失去父母、家產被抄、面臨貧窮成為失學的政治孤兒。第三代身處消費主義與政治無意識，無歷史痛感且記憶被抹除，為胡淑雯所描繪的各式失語狀態。下文將探討創傷者失語的幾種狀況：包含瘋狂是無效的證詞、受困的語言、第二代的無能言說三部分進行討論。

（一）變形記：瘋狂是無效的證詞

胡淑雯筆下遭國家逼迫而精神失序「政治精神病患」之所以無法言說，是因為其證詞被視為無效。胡淑雯在編寫《無法送達的遺書》時提及：「面對史料，我要求自己保持謙遜，將寫作者的自我縮小，將作家的表現欲收掉。」⁷²《太陽的血是黑的》將創作與「綠島牌老先生老太太」史料互文、佐證，挖掘出政治創傷的意義。胡淑雯創作時空已有不少口述歷史出版，許多白色恐怖的創傷與失序，窺見政治禁閉、政治威權與精神失序的關係，也呼應作品中的瘋狂。

因省工作委員會台南市工作委員會案遭判刑的張大邦，在晚年時經常在夢中驚醒而大吼大叫，於台大精神科就診，卻又不敢說出自己過往的經歷⁷³。其精神上的受苦是雙重的，一來自政治犯的櫃子而無法言說過往，其二則是此種「不可言說」又加深精神受苦。另一案例則是孟樊奇（音譯）被判刑出獄後，

⁷² 同註 70。

⁷³ 國家人權博物館，〈政治受難者張大邦口述歷史〉，（來源：https://imedia.culture.tw/channel/nhrm/zh_tw/media/40715，2019 年 4 月 5 日）。

講話內容天馬行空，背著家當成為街頭遊民，在七〇年代失去蹤影，或許已成為街頭無名屍⁷⁴。亦有女性政治受難者家屬在先生被槍決，見了丈夫的屍首後發狂，每晚就在墓地徘徊遊走，不幸遭人施暴、欺負，被警察當作流浪街女，因而被關在台北女監。她無罪本來不應該被關，但因瘋狂入監⁷⁵。上述政治受難者精神失序而面臨流離失所。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作品中，林雙不〈黃素小編年〉（1983）、胡淑雯《太陽的血是黑的》（2011）、馮馮《霧航：媽媽不要哭》（2003）⁷⁶皆將所聞所見、親身經歷的政治精神病患書寫下來。胡淑雯在《太陽的血是黑的》、林雙不在〈黃素小編年〉皆互文書寫了政治受難者流落街頭，而後成為街頭無名屍的情境。

政治犯出獄後，成為遊民、無家可歸者、政治精神病患，為在政治秩序、生活秩序、理性秩序之外的流離失所者。胡淑雯以「政治的精神病患」來命名因為政治因素而精神受苦之人。「瘋狂」者與眾不同、不服從社會規範，而被視為具有危險性而成為「烙印的」、需要矯正的、廢棄的局外人⁷⁷。當社會群體建立規則，若有人破壞了規則或作出不合時宜的行為時，就會被另眼看待而成為局外人（outsider）⁷⁸。胡淑雯如何書寫政治精神病患來控訴權力結構，政治高壓下的政治精神病患的失序與失語？

當瘋狂無法被理解，政治受難者的證詞便被視為無效。《太陽的血是黑的》以不同世代來思考不同層次的「不曾告人」、「無法告人」的失語狀態。若困境必須被解讀、被訴說，且「所有的傷口都渴望發言」，政治精神病患往往以世人無法理解的方式發言，印證「無法告人」的困境。《太陽的血是黑的》中的許席圖、2046 等政治犯、政治受難者家庭的第二代阿雪，皆呈現了政治精神病患的

⁷⁴ 曹瀛生訪談紀錄，收於許雪姬編，《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5年），頁500。

⁷⁵ 曹欽榮、鄭南榕基金會著，《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台北：書林，2012年），頁340。

⁷⁶ 馮馮，《霧航：媽媽不要哭》（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年），頁679。

⁷⁷ 高夫曼（Erving Goffman）提及污名成為「烙印」標示折受汙名者。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著，曾凡慈譯，《污名：管理受損者身份的筆記》（台北：群學，2010年）。羅伊·波特（Roy Porter）著，巫毓荃譯，《瘋狂簡史：誰定義了瘋狂》（新北：左岸文化，2018年），頁36-90。

⁷⁸ Becker, Howard, *Outsider: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6), p. 1.

兩難：「在深深的孤獨中難以訴說的困難，或記憶的不穩定感。」⁷⁹胡淑雯筆下的瘋狂之人如《哀艷是童年》中「野妓天晴」、《太陽的血是黑的》中的麥當勞小姐、田納西·威廉斯《慾望街車》的白蘭琪、受到性侵而住進療養院的阿莫、被刑求而瘋狂的許席圖，都是胡淑雯筆下瘋狂失序之人。這些人被棄置在家／國的秩序之外成為局外人。然而，胡淑雯企圖說的是，這些瘋狂之人之所以瘋狂往往來自於他們的良善與社會的不堪。其良善與社會的不堪卻使得他們落入難以取信於人的狀況。彭仁郁提到：「絕大部分的旁觀者選擇相信外表看起來人格健全、品德無暇、擁有社會資源的加害者，而看起來脆弱、無自信、不太正常、難相處的受害者，則難以取信於人，甚至經常受到汙衊。」⁸⁰胡淑雯筆下的失語與瘋狂者，往往才是真正可信之人，甚至是願意選擇記憶的人。選擇記憶卻被不堪的記憶打垮，而被掃進精神病院裡，被視為話語不可信的人（《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170）。這些可信之人白蘭琪、阿莫選擇記憶，仰賴「陌生人的仁慈」而倖存的可信之人，卻出現無人相信的矛盾性。

瘋狂的認定是一種社會行為，來自於世人無法理解而被定義為瘋狂。然而，往往是因為壓迫使壓迫者「失去理解他人話語的能力，或無法講出有意義的話」⁸¹。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威權建立起一套必須遵守的秩序，若逃脫於秩序之外會受到監禁的懲罰。然而，政治壓迫導致的精神失序，又形成無法被理解的監禁狀態。此種混沌形成無法被理解的「失語」。胡淑雯作品可以看見她對於記憶的執著，其筆下政治精神病患的語言，是沒有聽眾的「自言自語」與獨白，除了「沒人願意聽他說話」，更因為沒有人聽得懂他說的話。沒有人聽得懂，也就等於沒有說。所以瘋狂使得證詞無效。證詞的無效也往往被貶低為瘋狂的囁語，使得「冤」未被視為話語。〈小海〉一章從卡夫卡式孤獨帶出政治受難者 2046：

⁷⁹ 橋本恭子，〈書寫發現到宏大溫柔：評《太陽的血是黑的》〉，收於同註 4，頁 19。

⁸⁰ 彭仁郁，〈真相與正義：暴力創傷療癒的地平線〉，收於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著，施宏達、陳文琪、向淑容譯，《從創傷到療癒：性侵與家暴倖存者的絕望與重生》（新北：左岸文化，2018 年），頁 15。

⁸¹ 羅伊·波特（Roy Porter）著，巫毓荃譯，《瘋狂簡史：誰定義了瘋狂》，頁 19-173。

當人們要貶低某人的意見，習慣說那人是個瘋子，瘋子被說久了，也就瘋成真的了，譬如外公的同學 2046。

你問 2046 入獄前學了多久的國語，他就捧著一個畫框模樣的東西，說，「這裡有寫。」你們出了幾期刊物？刊物名稱你記得嗎？「這裡有寫。」……你在《野草》的筆名是什麼？2046 的回答依舊是：「這裡有寫。」你是先送保密局，還是軍法處？「這裡有寫。」你有什麼話，想要對當年的法官說嗎？2046 停頓幾秒，鄭重地說，「有。」你想說什麼？2046 抱著他的「回復名譽證明書」，肯定地說，「這裡有寫。」那張證書裱了框，立在客廳正中央：電視機上方。「戒嚴時期不當審判回復名譽證明書」。

2046 的太太說：以前他不敢說、不能說，等到總算可以說出來的時候，已經沒有人要聽了；這幾年，開始有年輕人想要聽，他卻又說不出來了。2046 今年八十歲，在「綠島牌老先生」裡算是很年輕的一個，一九五一年春天被捕時，他才剛滿二十歲。（《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20-21）

此處可以看見政治精神病患的無法言說包含兩個層次：一是無法為自己進行證言；其次是其證言沒有人相信。兩個層次皆使政治精神病患無法成為見證人。2046 抱著的「戒嚴時期不當審判回復名譽證明書」為唯一的證言。證明書取代了人可以說話的權力，刻劃著政治恐怖的遺緒。這一段瘋癲的書寫，正如《超級大國民》的政治受難者吳勝國每天戴上耳機聽著「反攻大陸去」的「老瘋癲」情境。吳勝國監督自己「不能再亂說話」，否則「腦袋裡面被政府裝了電子偵測器」，有被政府接收到的危險⁸²。在內心小警總監督下而不敢言說、不敢思考，呈現的「失語」的扭曲與極致狀態。正如同 2046 抱著他的「回復名譽證明書」反覆呢喃的「這裡有寫」的「老瘋癲」都是處在警備狀態的精神失序。精神失序一方面成為無效的證詞，另一方面指控政治力量使人失去話語權。

⁸² 萬仁導演，《超級大國民》（台北：群體娛樂代理，2017 年）。

陳儒修提到被毀掉的、被迫消音的過往，都是必須記憶的⁸³。然而胡淑雯筆下需要被深刻記憶的卻已然無法言說、話語無效。瘋狂者是被排除的、失落的人，當非理性經驗在理性社會中被排除，「瘋狂的聲音遭到限制、隔離而趨於沉默」⁸⁴。白色恐怖下的瘋狂者是無法被收納至威權秩序而被視為溢出理性／威權邊界之人。劉婉俐指出瘋狂有逃脫宰制的可能性⁸⁵，但在白色恐怖下的瘋狂，則成為自言自語、無法被理解、話語被貶抑、禁閉在語言的監獄，形成「這不是人說的話」。然而，胡淑雯以白蘭琪暗示瘋狂：「瘋子在最重要的一件事上說了真話，但是她並不享有說真話的權利，因為她失去了『正常』此一人性的基本配備。」（《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123）政治精神病患選擇記憶但被記憶打垮，掃進精神病院裡面，拒絕「失語」與失憶卻因而被排除在理性、正常之外，其證詞成為無效，道出語言的矛盾性：說了真話卻無人理解。

（二）受困的語言：失去話語權、肉身凋零、語言被貶抑

胡淑雯筆下渴望言說之人往往面臨失去話語權、肉身凋零、語言被貶抑等話語無效的困窘。胡淑雯敘述對知識、政治感興趣的政治犯阿公，沒有人願意聽這名老去凋零的政治犯說話，勢必要變成沒有發言權也沒有實質的政治權力，絮絮叨叨的政治評論員。胡淑雯「很悲傷的看到了沒有權力的人如何的說話，而且他們的語言就是他們的寫作」⁸⁶，阿公是「一個長年受困的人，在語言上受困，在敘事能力上也受困，在政治行動上也受困，在被這個社會理解上也受困的人，他事實上是相當渴望有一個聲音可以成為他的聲音」⁸⁷。失去政治空間及言說空間的人，渴望被理解卻語言受困。政治受難後代陳柏謙之祖父因為參加讀書會而入獄，晚期住在精神療養院，對家人來說如熟悉的陌生人。

⁸³ 陳儒修，〈歷史與記憶：從《好男好女》到《超級大國民》〉，《中外文學》25卷5期（1996年5月），頁47-57。

⁸⁴ 李尚仁，〈如何書寫被排除者的歷史：金士伯格論傅柯的瘋狂史研究〉，《科技醫療與社會》第3期（2005年9月），頁175-227。

⁸⁵ 劉婉俐，〈神聖與瘋狂：藏傳佛教的「瘋行者」傳統 vs. 傅柯瘋狂病史的權力論述〉，《中外文學》32卷10期（2004年3月），頁145-171。

⁸⁶ 胡淑雯、莊瑞琳，〈人如何變態成人〉，收於同註4，頁81。

⁸⁷ 同註81，頁19。

陳柏謙提到幾乎喪失正常溝通能力的祖父，「每次見到我，所能夠作出最親暱的動作，就只是在祖母與父親依慣例介紹我時，清了清喉嚨，發出幾聲無法辨識的氣音後，繼續回到他那讓外人無法理解的混沌狀態。」⁸⁸此種混沌的狀態，是語言困窘而無法被理解的失語與失序。

其次，因肉身凋零而失去話語如 2046 的同案難友 2051：

與 2046 同案的 2051 小他一歲，兩度中風，由印尼媳婦推出來，面向牆壁而非來訪的客人（可見他像一株植物被人由床上移到客廳的時候，多半為了面壁看電視），一句話說得快要斷氣，口水滴滿前襟，舌頭肥得像中毒的豬肝。

2051 用盡殘廢者吃奶的力氣，耗了半個多小時，總算湊出一句眾人聽懂的人話。那支離破碎可憐兮兮、濕答答且熱乎乎的一句話是：我一忘—記—了（《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20-21）。

胡淑雯在 2009 年跟著「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訪問政治受難者時，其中一位被抓時還不滿 19 歲，2009 年時已經 79 歲：

他經歷了兩度中風，說話的時候一直流口水，我們幾乎聽不懂他在說什麼，花很多時間好不容易聽懂他說的話，竟然是：『我不記得了。』他花很多力氣，只能向我們表達一個訊息：我不記得了。⁸⁹

胡淑雯將這段經歷寫進小說，已經中風的政治受難者的言說，終於被聽懂，然而可以被記憶的一句話，是「我一忘—記—了」。此處弔詭地寫出唯一被記憶的竟是「遺忘」本身，這種矛盾性，呈現的一種對於過往歷史無法被記憶的悲涼感與不穩定性。

受困的語言第三種情境則是自身語言被貶抑。李文心的外婆與胡淑雯的外婆兩人相互影射。在《字母 LETTER：胡淑雯專輯》、《哀艷是童年》、《太陽的

⁸⁸ 陳柏謙，〈挖掘、拼湊歷史過程中遺忘「歷史」的陷阱：一個「白色恐怖」口述史入門工作者的自我意義探求〉，《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103 期（2016 年 6 月），頁 191-199。

⁸⁹ 同註 71，頁 71。

血是黑的》互文書寫具有本省族群、女性、政治犯家屬多重身分的「外婆」。在族群上，外婆於戰後「在語言所無形制定的社會價值之下運作，背棄了沒有文化的原生家庭、不堪入耳的第一母語、上不了檯面的台式文化」⁹⁰。如同《太陽的血是黑的》中的政治犯之妻為求生存在戰後初學國語，「北京話講得零零落落，結結巴巴像智障，讀不懂字據，被迫當文盲」的尷尬困窘。其次，當1951年政治犯大舉移送綠島時。政治犯的外公告別妻女在島上服刑十五年，出獄後才重返那再也回不去的家。在丈夫入獄後，外婆為了營救而行賄，但丈夫依然沒有出獄。「沉默至彷彿失語的外婆」與時代格格不入：「幸運的常人並不瞭解，一個女人驟然失去丈夫是什麼滋味，丈夫被指控叛國是什麼意思，單身的寡婦與抱著兩個孩子的寡婦，誰比誰更有希望一點？」罹患憂鬱症的外婆，話語失序最極致狀態，則是死亡。「記不得從哪一天開始，外婆不再說話了，靜得像一座廢墟，任時間在身上爬過，走滿蛛絲。」晚年以自殺終結自己的生命（《太陽的血是黑的》，頁133-185）。

2000年胡淑雯患有憂鬱症的外婆過世，促成她寫〈真相只有一種〉⁹¹。〈真相只有一種〉中，外婆失去話語權還在於其家屬身分。當丈夫入獄，「眾口同聲論斷妳的人生除了痛苦別無其他」，外婆葬禮那一天，「來了上百人，一屋子老政治犯，滿滿是外公的獄友。他們深深鞠躬，朗讀哀悼文，哀悼的是政治，不是妳」⁹²。政治犯之妻死亡後，被哀悼的是政治犯，卻無政治犯家屬，外婆依然沒有話語權的困境。沈秀華指出女性受難者不該被視為「間接受難者」，因為「政治受難者家屬就是政治受難者」⁹³。胡淑雯呼應了家屬如何成為政治苦難的配角。身為本省籍族群、女性、受難者家屬的三重身分面臨了文化殖民、政治逮捕、家庭破碎、政治犯的配角而日漸沉默。

⁹⁰ 胡培菱，〈童年的倖存與殘存：過（不）去的艱難〉，收於同註4，頁14。

⁹¹ 張耀仁，〈跨越界線之謎：訪胡淑雯〉，《印刻文學生活誌》2卷8期（2006年4月），頁124-128。

⁹² 同註1，頁77。

⁹³ 沈秀華，《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台北：玉山社，1997年）。

（三）受難者第二代：精神失序、階級位置與無能言說

政治受難者第二代在面臨抄家產、父親入獄後，多面臨生活困窘、失學而成為無能言說之人。第二代包含政治受難者 2051 那搬家工人的兒子，以及父親入獄後無法得到適當教育的阿雪。吳乃德在探討威權遺產時，提到當受難者家庭中，倘若父親被判刑，對於整體家庭的影響是「子女不只失去父親，也失去經濟支柱，生活陷入困頓、前途變得黯淡」⁹⁴，胡淑雯筆下的政治受難後代便鑲嵌在求職困難、生涯中斷、沒收財產導致後代經濟的困頓的脈絡下。2051 那搬家工人的兒子面對訪問政治受難者的訪問者，因著自身工作上的疲憊與不耐煩對來訪之人說：「沒什麼好問的你們快走吧，我剛收班，我要睡覺」（《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21），胡淑雯筆下的第二代，或因為經濟狀況成為勞動工人；或因為政治因素中斷學業，在嚴峻的歷史與現實條件下對於過去無能為力。

胡淑雯討論政治受難者之妻（外婆）、第二代（阿雪）、第三代（李文心），關注女性家屬與家庭世代的政治受難經驗。身為政治受難家庭第二代的阿雪，政治變遷導致的經濟困頓使其失去就學的機會。胡淑雯外公外婆皆高校畢業，自陳如果不是政治的緣故，母親「那一代應該不會這麼沒得念書，座落在他們身上的政治確實是徹底改變了他們的命運」⁹⁵。胡淑雯的母親因政治因素只有小學畢業，外公是政治犯讓胡淑雯充分意識到政治如何座落在家族身上。胡淑雯將母親化身為精神失序者、失學文盲、失語的阿雪。阿雪三歲時，父親入獄，「是讀書讀到被抓去關了」，阿雪因而失去繼續升學的機會。曹欽榮形容白色恐怖時期「知識成為人生的負擔，思想與當局所認定產生歧異，甚至危及身家性命」⁹⁶。此外，父親入獄經濟困頓與政治恐懼而即使考上中學也無法去註冊，因此因父親入獄而成為「文盲」（《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197）。阿雪的失學是政治恐懼、經濟困頓雙重下的結果。

父親入獄後，母親外出當幫傭，如孤雛般獨自長大的阿雪必須「在別人的田裡撿拾採剩的菜葉。身為一個寄宿者，一個準孤兒，總覺得要很乖乖很勤勞，

⁹⁴ 吳乃德，〈民主時代的威權遺產〉，收於同註 46，頁 60。

⁹⁵ 同註 4，頁 80。

⁹⁶ 同註 66，頁 152。

不斷地工作，才有資格繼續住下來。」女性政治孤兒亦面臨性侵的威脅，政治孤雛阿雪在童年遇上逃兵遭性侵未遂卻無人可訴說。阿雪從來沒有說出口究竟「是不敢說，不想說，還是不知道要說？」，真正的原因是「要說給誰聽呢？」。因為可以聽她哭訴的「爸爸入了監，媽媽去了台北」，想訴說的對象都不在身邊。第二代的失語來自於最親密的可訴說對象的不在場。不在場更形成情感的疏離。父親入獄時阿雪三歲，十九歲父親歸來。因而叫不慣「爸爸」兩字，改叫爸爸「先生」，或者「老頭」（《太陽的血是黑的》，頁193）。成人阿雪買過期牛奶、不認得女兒、無法入睡，被困在某個「過去」的轉彎處，日常生活的能力被破壞，最後進到精神病院。阿雪的精神失序來自被剝奪被扭曲的成長過程。第二代的生活慘澹與無人聞問成為無法訴說的原因。

胡淑雯詮釋的白色恐怖的影響，遠遠不只是逮捕、審問、判刑，更延伸到第二代的困頓、失學、性侵的可能性。第二代的失語，來自於可訴說對象的不在場，被剝奪被扭曲的成長過程是威權體制的延伸與遺緒。胡淑雯以「家族」思考政治受難。阿雪因父親入獄而經濟困頓與政治恐懼，使其考上中學也無法去註冊，自稱「文盲」；面臨性侵無人可訴說；父女疏離而叫不慣「爸爸」兩個字。胡淑雯從第一代政治受難者寫到第二代的政治孤雛，以「家族」不同世代思考政治創傷。胡淑雯書寫政治創傷的世代延續，日常生活的秩序在清理創傷之前難以回歸秩序。

五、需要改造之人與家／國的「冗餘者」

政治精神病患因為「證詞無效」而失去話語權。此外，精神病患與政治犯皆被視為需要被改造之人。傅柯（Michel Foucault）以權力／知識視角指出「不正常的人」（如「畸形人」（*monstre*）、「需要改造的人」（*individu a corriger*）和「手淫的兒童」（*enfant masturbateur*））為精神醫學以知識／權力涉入瘋狂論述的對象，被貶低為「不正常的人」因而有改造為「正常的人」的必要，以達到國家政治的目的⁹⁷。上述「偏差之人」擴及政治犯、精神病，在大監禁的歷史

⁹⁷ 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著，錢翰譯，《不正常的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國家政策也展開對於瘋人的監護，形成一場「盲目壓抑」的運動⁹⁸。對於「偏差之人」的監禁與監護，目的除了隔離亦進行矯正。

白色恐怖案件中，因為刑求、威嚇各項肉體與精神折磨而被送至精神療養院最為人知曉的案例為許席圖。許席圖 1940 年生於雲林，就讀政大期間因「統中會事件」於 1966 年被捕。被捕後，「在黑牢中被刑求逼供，因為受不了酷刑而發瘋，至今仍關在花蓮玉里療養院裡」，再也無法重返社會，「不知今夕是何夕，也不清楚自己為什麼還生活在這小小的空間裡」⁹⁹。許席圖觸犯政治禁忌；違反政治秩序而被監禁於政治牢獄中，後瘋狂而偏離情緒政體，受到的依然是監禁。傅柯提到法律、教育、醫學會建構出「需要改造的人」，並將之貶低為「不正常的人」，為達到國家政治目的而企圖將之改造為「正常的人」¹⁰⁰。這些被國家視為偏差的政治犯，政策也會展開監護形成一場「盲目壓抑」運動¹⁰¹。因此，不吻合國家政治規範的人會成為需要改造之人，面臨政治監禁與精神監禁。兩種監禁使瘋狂成為無法有效言說的沉默。胡淑雯在小說〈睡不著〉一章書寫阿雪前往精神病院，時空返回白色年代的許席圖：

一九六六（這不是大家習慣的白色年代），政大學生許席圖，讀了一篇報紙投書，「人情味與功德心」，美國旅台學生寫的文章。投書中批評國人的壞習慣，令愛國的許同學生出滂然的羞恥心，號召大學生投入公益，「以服務淨化社會」。許同學「籌組叛亂組織」，被捕後刑求發瘋，送入療養院直到死亡。

當時的療養院，只能說是瘋人院。所謂的治療，無非網綁、打罵與電擊。與「政治」對他們的「治療」並無差別。（《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329-330）

2003 年），頁 43-109。

⁹⁸ 同註 85，頁 123。

⁹⁹ 林恩魁口述，曹永洋著，《荊棘·冠冕·動盪歲月：林恩魁傳》（台北：草根，2008 年），頁 145。

¹⁰⁰ 同註 97。

¹⁰¹ 同註 85，頁 123。

許席圖並非在大鎮壓地下黨的時代被捕，胡淑雯透過書寫許席圖指控了政治鎮壓並非只是鎮壓地下黨，而是以打破剿匪之名合理化自身政權。此處，精神病院與政治牢獄相互隱喻，兩者皆是刑求、網綁、打罵與電擊。影射了政治犯面臨的是一種精神改造；而精神病患面臨的是一場政治控制，政治犯與精神病患都是傅柯所言的「需要改造之人」。馮馮在《霧航：媽媽不要哭》也書寫白色恐怖的「共匪嫌疑犯」被以精神矯正的機制矯正，政治犯被送至電療室、被強制送至精神病院的懲罰¹⁰²。統治者將醫學與軍隊結合，矯正懲罰違背國家情緒政體、「不正常」的政治犯與精神病患。傅柯提到：「18世紀末出現的第一個道德畸形，至少也是最重要的，最顯著的道德畸形，就是政治犯。」¹⁰³在白色恐怖時期，道德畸形的第一張臉譜，就是政治畸形，「共匪嫌疑犯」被視為危及國家體制，因而政治犯以精神疾病的方式被處置，「政治畸形」被視為道德上的殘缺者，成為需要改造之人。另一層面，精神病患亦受到政治監禁，與政治犯同樣面臨網綁、打罵與電擊。「政治」與「治療」並無差別，都是威脅國家政體而需要矯正的人。

此外，不符社會規範的局外人，若非受到監禁，便是遭到社會棄置。齊格蒙·包曼以「廢棄人」、「人類廢棄物」形容被社會拋棄的多餘人口。不符合秩序建構與經濟進步邏輯的人會被「挑選／淘汰」的機制淘汰，成為國家和社會判定的「廢物」，予以剔除公民身份而成為無用之人¹⁰⁴。廢棄的人口成為多餘、不需要、沒有用的「冗餘人」與「邊緣人」，而失去賴以為生的社會¹⁰⁵。精神病患、「行為偏差」、社會局外人往往有面臨了「冗餘人」的處境。胡淑雯筆下的冗餘者包含政治精神病患、政治遊民、政治孤兒。政治精神病患則有兩個意義上的「過剩」：一是政治犯不符合國家主權秩序與邊界的過剩；二是精神疾病者被視為無用之人的過剩。此外，政治遊民與政治孤兒則是失去社會維繫、橫死街頭成為社會剩餘之人。胡淑雯以「剩餘之人」來比喻形容被切割「多餘之處」

¹⁰² 同註 76。

¹⁰³ 同註 97，頁 99。

¹⁰⁴ 宋國誠，〈被報廢的世界——齊格蒙·包曼「全球廢棄物理論」〉，收於齊格蒙·包曼 (Zygmunt Bauman) 著，谷蕾、胡欣譯，《廢棄社會：過剩消費、無用人口，我們將淪為現代化的報廢物》(台北：麥田，2018年)，頁 9。

¹⁰⁵ 同註 104，頁 38-86。

以符合社會標準的人，被切割而剩下的人則成為「殘餘之人」，正呼應政治精神病患、政治遊民、政治孤兒為體制外的殘餘之人。

胡淑雯書寫到類似許席圖的案例繁多，如：

花蓮的玉里療養院，前後總共收容過四百多個這一類，政治精神病患。也有的，不曾住院也沒回家。例如吳同學，陸軍官校畢業生，精通中國史，『能從黃帝背誦到近代』，獄中聽說弟弟慘遭酷刑至死，精神崩潰直到出獄，不知飢寒溫飽，離家遊蕩，四十五歲就死了。（《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329-330）

精神失序之人，命運則是失去秩序之人在街頭流離失所，甚至貧困終身或橫死街頭：

綠島有個姓王的，哭哭笑笑自言自語，離營上山一去不回。發現時已成腐屍。

就連我遇劫的那條大道路，也收容著一段類似的身世。

事主是個老兵，黃埔六期，湖北人。共產黨拿下湖北，他投奔老K來到台灣，在萬華夜市作生意。這人犯了什麼罪？資料不明不確定。出獄後已經失神，送到貧民住宅，再轉送松山痲病院（《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329-330）。

關於政治精神病患成為「冗餘人」與「邊緣人」的書寫，早在林雙不〈黃素小傳〉書寫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黃素便出現類似的關懷。黃素在政治混亂中被逮捕且判決死刑。在執行槍決前一刻，被改判無罪。然而黃素在高度驚恐下瘋狂。回到家之後，迎著黃素而來的是一個變形的家，父親在黃素失蹤後一病不起，母親則中風癱瘓在床。親家前來取消婚事，理由是「金海不能娶政治犯」。黃素回到小村之後，整天喃喃自語著「我不要槍殺，我不要槍殺……」¹⁰⁶。即將結婚的黃素，在二二八的混亂中被抓，受盡折磨後雖無罪釋放，但「起痲了」。

¹⁰⁶ 同註 9，頁 65-72。

黃素的瘋狂的意義有兩個面向，一是婚事取消，黃素從此成為婚姻的冗餘人；二來其被冤枉的「政治犯」身分而成為社會的冗餘人。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婚姻與家庭為女性最主要的歸宿，無法進入婚姻的女性，則成為不符合社會規範的成員，成為婚姻體制外的「冗餘人」與「廢棄之人」，一位可貶的受污名者。女性與瘋狂是常見的書寫議題，桑德拉·吉爾伯特（Sandra Gilbert）與蘇珊·古巴（Susan Gubar）在《閣樓上的瘋女人》¹⁰⁷書寫到受到壓抑的女性處境，雖然瘋婦是被妖魔化的女性，但也正是挑戰秩序的力量¹⁰⁸。然而黃素之瘋狂處境並非「閣樓上的瘋女人」，而是被棄置的「街頭上的瘋女人」。在父權文化下，婚姻成為女性重要的歸屬，黃素的瘋與政治上的冤，使得女性失去家庭與婚姻的可能性，成為婚姻體制中「多餘的」和「過剩的人」，成為「不適合的」、「不合格的」女性。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指出「人們對暴行的一般反應是將它排除在意識之外。某些違反社會常態的事，若恐怖到無法清楚表達出來，就只能用難以啟齒（unspeakable）這幾個字來形容。」所以被釋放後的黃素無法言說，其反覆呢喃、自言自語的政治精神病患的狀態，其反覆呢喃「我不要槍殺」訴說的是一個「冤」字。黃素之所以成為「人類廢棄物」，是被社會拋棄的多餘人口，來自於黃素不符合秩序建構而成為「挑選／淘汰」機制下被淘汰掉的人，一是政治犯身分使其成為婚姻的過剩人口，其次是精神疾病使其成為社會的無用之人。

同樣的，胡淑雯對於政治精神病患的書寫，其懲罰並非來自於命定，而是來自於政治壓迫、國家機器。卡爾克提到：「壓迫會讓一個智者瘋狂。¹⁰⁹」瘋狂往往是壓迫、創傷的症候，症候指涉著政治現狀的不合理與自身格格不入。探討「精神失序」的重要研究者蔡友月在討論族群與精神失序的關係時，將「精神失序」視為一種社會受苦（social suffering），是社會變遷造成精神苦難，因

¹⁰⁷ 女人與瘋狂常是如影隨形、互文書寫的主題。從吉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黃色壁紙》受到父權禁閉的女性；白朗特（Charlotte Brontë）《簡愛》中來自殖民地的閣樓上的瘋女人，都書寫了自我受到禁閉、禁聲、壓抑的「閣樓上的瘋女人」的形象，那些違反社會規範的女性被視為瘋狂，受到禁閉而瘋狂；更因瘋狂後更面臨禁閉，「閣樓上的瘋女人」隱喻著受到扭曲、壓抑、禁閉的女性。

¹⁰⁸ Gilbert, Sandra and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¹⁰⁹ 同註 81，頁 107。

此必須從受苦的經驗與社會脈絡來理解¹¹⁰。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指出規範性的情緒政體（emotional regime）是支撐穩定政權的基礎，而偏離情緒政體的人，就會受到情緒上的磨難¹¹¹。違背國家意志的人正是偏離此情緒政體之人。

政治精神病患此類「冗餘者」，離家遊蕩、橫死街頭，為家／國無法容納的人。玉里療養院四百多位的政治精神病患街頭流離失所、橫死街頭、或被送到貧民住宅，與黃素一樣成為家／國的冗餘人。政治犯不符合國家主權秩序與邊界而過剩；其次則是精神疾病者成為「家」秩序外的無用之人。胡淑雯呼應著多餘、不需要、沒有用的「冗餘人」與「邊緣人」：

六十年前 9047 僅僅二十二歲，自保密局離開的時候已經嚇破了膽，送往軍法處，九個月後轉往火燒島，刑滿的時候已經沒有家了。找不到人做保，9047 在火燒島額外滯留了六年，連本刑總共二十八年，再出社會的時候，恰巧接上獅子林熱鬧開幕。循著記憶來到舊地，自此不再離開。當初他之所以回返，是為了揮別過往、拒斥恐懼。重訪是為了否定，為了離開。怎料到 9047 被魘住了，豈止無法離開，反而無可抗拒留在原處，就地當起遊民。（《太陽的血是黑的》，頁 139）

政治犯在刑期服滿之後，若無人擔保則無法出獄無家可歸，縱使出獄後失去所有社會網絡也可能成為遊民。除了政治遊民之外，尚有政治孤雛，胡淑雯詮釋了影射楊揚的浩子的故事。楊揚是張志忠（1910-1954）和季澐（1921-1950）的小孩，季澐與張志忠在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被破獲後遭逮捕，楊揚兩、三歲時跟著母親坐牢。父母槍決後，楊揚由保密局汽車保養隊老兵照顧，卻於 18、19 歲時自殺¹¹²。胡淑雯這樣描述：

¹¹⁰ 蔡友月，《達悟族的精神失序：現代性、變遷與受苦的社會根源》（台北：聯經，2009 年），頁 78-79。

¹¹¹ 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提出的「情緒政體」（emotional regime）概念，見劉峻著，官晨怡譯，〈情緒的文化政治〉，收於王文基，巫毓荃編，《精神科學與近代東亞》（新北：聯經，2018 年），頁 225-226。

¹¹² 關於楊揚的紀錄可參考註 62，頁 88；同註 39，頁 362-376。

浩子才三歲，就跟爸媽進了監獄，關在保安處。阿兵哥叫他唱國歌，他跟著爸媽唱道，「三民主義，『你』黨所宗，」天生的叛亂份子、「小共產黨」。阿兵哥扯開他的褲檔，拿衣夾弄傷他的小雞雞。

槍決前，父母寫了遺書，縫進浩子的冬衣，遺書裡囑咐日後若有困難，可以去找一位方叔叔。

保安處理一個司機可憐浩子成了孤兒，將他收容在軍車保養廠裡。

他是被殺了父母的特務機構養大的。

浩子在十八歲那年找到了方叔叔，他渴望有個家人，找份工作，也繼續讀書，接受大學教育。爸媽在遺書裡說得斬釘截鐵，方叔叔是唯一值得信靠的人。怎料方叔叔不願受到牽連，當面將遺書撕毀。浩子捧著碎成裂片的、對人心最後的一絲信念，回到西門町，重返父母死亡的地點，投宿附近一間旅舍，上吊身亡，遺書給當時頗有名望的專欄作家，柏楊。（《太陽的血是黑的》，頁147）

柏楊於1968年因為大力水手的連環漫畫而入獄，在入獄前寫下楊揚的遭遇。影射楊揚的浩子是胡淑雯筆下歪七扭八，被社會棄置、遺忘的人渣與廢物。上述精神病患、「行為偏差」、社會局外人往往有面臨了「冗餘人」的處境。

在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精神病患則有兩個意義上的「過剩」：一是政治犯不符合國家主權秩序與邊界的過剩；二是精神疾病者被視為無用之人的過剩。政治犯挑戰了國家主權；精神病患違反具生產性的可用之人的定義，因而既是政治犯又是精神病患的政治精神病患則成為兩個層次上的無用與剩餘。這些「政治精神病患」被視為無用、剩餘與破壞規矩的人，會承受著來自社會群體的汙名。高夫曼汙名（Stigman）概念包含身體的上畸形或缺陷、人格上的缺失、種族、國族與宗教的族類汙名等不同層次，受汙名者又可以分為一眼可辨識的「明貶者」以及可隱匿的「可貶者」¹¹³。「政治精神病患」被視為是政治畸形、政治人格缺失而受到國家制裁。

¹¹³ 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著，曾凡慈譯，《汙名：管理受損者身份的筆記》（台北：群學，2010年）。

政治精神病患離家遊蕩、自言自語、最後成為街頭無名屍。拜倫·古德（Byron J. Good）認為瘋狂是「被詮釋的失序」（interpreted disorder）¹¹⁴。政治精神病患無法為自身辯駁、無法為創傷言說、說了也沒有被理解，更被排除在家／國之外。王文基描述瘋狂：

失常的嚴重程度，乃至家庭與社會背景的不同，自然也影響處置瘋狂或精神疾病的行動軌跡與策略。在精神失常者經常遊走於鄉間與城市中，或被拘禁於家中的背景中，瘋人的確頗貼近報章雜誌、文學作品中常呈現的社會秩序破壞者，或身處另類存在樣態的邊緣人。¹¹⁵

上述政治精神病患成為無法進入婚姻秩序、家庭秩序與社會秩序的邊緣人；遊民與政治孤兒則失去社會網絡，整合不進社會，成為家／國之外的冗餘者。

六、結論

本文所探討胡淑雯的白色恐怖書寫，分為三個主題進行討論：對體制與協力者的批判、訴說之必要與言說之困境、需要改造之人與家／國的「冗餘者」三部分進行討論。

在對體制與協力者的批判上，分別又提出體制的非法性、獎金的荒謬性、刑求的非人性；以及當權者如何剷除記憶所繫之處、體制協力者與不同世代的歷史繼承者。第二部分探討訴說之必要與言說之困境：首先，政治精神病患失去證詞的有效性與無法言說包含兩個層次：無法為自己進行證言；其證言沒有人相信，兩者皆使其無法成為見證人。其次，受困的語言的人可能因肉身凋零、語言被貶抑、精神失序、階級位置與無能言說而失去話語權。胡淑雯在書寫言說困境，回應了當下對於政治受難者記憶政治，點出記憶與證詞的艱難。胡淑雯強調記憶過往的重要但卻有艱難的矛盾。

¹¹⁴ 同註 110，頁 264。

¹¹⁵ 王文基，〈瘋狂、機構與民國社會〉，收於劉士永、王文基編，《東亞醫療史：殖民、性別與現代性》（新北：聯經，2017年），頁 93。

第三部分討論需要改造之人與家／國的「冗餘者」。包含政治精神病患、政治遊民與政治孤兒。政治精神病患在政治犯與精神病雙重意義上被視為需要矯正。精神病院與政治牢獄亦相互隱喻，兩者皆是刑求、綑綁、打罵與電擊，影射了政治犯面臨的是一種精神改造；而精神病患面臨的是一場政治控制。政治犯與精神病患都是不吻合國家政治規範而成為需要改造之人。政治精神病患、政治遊民與政治孤兒則如同「冗餘者」，政治精神病患受到政治與家庭的雙重排除，成為社會的冗餘者；政治犯不符合國家主權秩序與邊界的過剩；精神疾病者在「家」秩序外的無用之人，是離家遊蕩、橫死街頭，為家／國無法容納的人，而遊民與政治孤兒則是因為政治災難而被社會棄置。

參考書目

一、專書

- 丁名慶、陳蕙惠、楊凱麟、黃崇凱編，《字母 LETTER：胡淑雯專輯》（新北：衛城，2018年）。
- 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著，曾凡慈譯，《污名：管理受損者身份的筆記》（台北：群學，2010年）。
- 王文基、巫毓荃編，《精神科學與近代東亞》（新北：聯經，2018年）。
-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卷一·清理威權遺緒》（新北：衛城，2015年）。
-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卷二·記憶歷史傷痕》（新北：衛城，2015年）。
-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卷三·面對未境之業》（新北：衛城，2015年）。
- 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著，錢翰譯，《不正常的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著，尉遲秀譯，《笑忘書》（台北：皇冠，2002年）
- 呂蒼一、胡淑雯、陳宗延、楊美紅、羅毓嘉、林易澄，《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新北：衛城，2015年）。
- 施明正，《施明正短篇小說精選集》（台北：前衛，1987年）。
- 李昂，《北港香爐人人插：戴貞操帶的魔鬼系列》（台北：麥田，1997年）。
- 李昂，《迷園》（台北：麥田，2006年）。
- 李喬，《告密者》（台北：自立報系，1986年）。
- 沈秀華，《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台北：玉山社，1997年）。
- 周婉窈，《轉型正義之路：島嶼的過去與未來》（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2019年）。

- 林正弘、潘光哲、簡明海編，《殷海光全集：政治與社會（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
- 林恩魁口述，曹永洋著，《荊棘·冠冕·動盪歲月：林恩魁傳》（台北：草根，2008年）。
- 林雙不，《小喇叭手》（台北：前衛，1991年）。
- 林雙不，《大學女生莊南安》（台北：前衛，1991年）。
- 阿岡本（Giorgio Agamben）著，薛熙平譯，林淑芬：〈導讀〉《例外狀態》（台北：麥田，2010年）。
- 施明正，《施明正集》（台北：前衛，1993年）。
- 施淑、高天生編，《林雙不集》（台北：前衛，1992年）。
- 胡淑雯，《太陽的血是黑的》（新北：印刻，2011年）。
- 胡淑雯，《哀艷是童年》（台北：印刻，2006年）。
- 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著，施宏達、陳文琪、向淑容譯，《創傷到療癒：性侵與家暴倖存者的絕望與重生》（新北：左岸文化，2018年）。
- 張炎憲、許明熏、楊雅慧、陳鳳華，《風中的哭泣：五〇年代新竹政治案件》（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2年）。
- 曹欽榮，《自由遺產：台灣 228、白色恐怖紀念地故事》（台北：台灣游藝，2017年）。
- 曹欽榮、鄭南榕基金會，《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台北：書林，2012年）。
- 許俊雅編，《無語的春天——二二八小說選》（台北：玉山社，2003年）。
- 許雪姬編，《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5年）。
- 陳建忠，《記憶流域：台灣歷史書寫與記憶政治》（新北：南十字星文化工作室，2018年）。
- 陳映真，《春祭》（台北：行政院文建會，1995年）。
- 陳映真，《陳映真小說集 5》（台北：洪範，2001年）。
- 陳映真，《陳映真作品集 5》（台北：人間，1988年）。

- 喬治·歐威爾 (Orwell George) 著，徐立妍譯，《一九八四》(台北：遠流，2012年)。
- 茱蒂絲·赫曼 (Judith Herman) 著，施宏達、陳文琪、向淑容譯，《從創傷到療癒：性侵與家暴倖存者的絕望與重生》(新北：左岸文化，2018年)。
- 馮馮，《霧航：媽媽不要哭》(上)(中)(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年)。
- 黃文成，《關不住的繆思——臺灣監獄文學縱橫論》(台北：秀威資訊，2008年)。
- 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 50 年代》(台北：前衛，1991年)。
- 葉石濤，《台灣男子簡阿淘》(台北：草根，1994年)。
- 齊格蒙·包曼 (Zygmunt Bauman) 著，谷蕾、胡欣譯，《廢棄社會：過剩消費、無用人口，我們將淪為現代化的報廢物》(台北：麥田，2018年)。
- 劉士永、王文基，《東亞醫療史：殖民、性別與現代性》(新北：聯經，2017年)。
- 蔡友月，《達悟族的精神失序：現代性、變遷與受苦的社會根源》(台北：聯經，2009年)。
- 鄭清文，《報馬仔》(台北：圓神，1987年)。
- 鄭清文，《鄭清文短篇小說全集——白色時代》(台北：麥田，1998年)。
- 蕭颯，《返鄉笥記》(台北：洪範，1987年)。
- 薛化元，《戰後台灣歷史閱覽》(新北：聯經，2015年)。
- 藍博洲，《台共黨人的悲歌：張志忠、季滄與楊揚》(新北：台灣人民，2012年)。
- 藍博洲，《台灣好女人》(台北：聯合文學，2001年)。
- 藍博洲，《老紅帽》(台北：南方家園文化，2010年)。
- 藍博洲，《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新北：台灣人民，2017年)。
- 藍博洲，《紅色客家人》(台中：晨星，2003年)。
- 藍博洲，《紅色客家庄：大河底的政治風暴》(台北：印刻，2004年)。
- 藍博洲，《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台北：時報出版，1994年)。
-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出版，2004年)。
-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續曲》(新北：印刻，2016年)。
- 藍博洲，《藤纏樹》(台北：印刻，2002年)。
- 藍博洲，《高雄二二八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民眾史》(高雄：春暉，1997年)。

羅伊·波特 (Roy Porter) 著，巫毓莖譯，《瘋狂簡史：誰定義了瘋狂》(新北：左岸文化，2018年)。

蘇瑞鏘，《白色恐怖在台灣：戰後台灣政治案件之處置》(新北：稻香，2014年)。
Becker, Howard, *Outsider: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6).

Althusser, Louis,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1).

Gilbert, Sandra and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二、論文

(一) 期刊論文

吳懷晨，〈快樂的罪行：陳映真救贖三部曲結構中的罪與聖〉，《中外文學》41卷1期(2012年3月)，頁87-135。

李尚仁，〈如何書寫被排除者的歷史：金士伯格論傅柯的瘋狂史研究〉，《科技醫療與社會》第3期(2005年9月)，頁175-227。

辛佩青，〈卑賤作崇／遂——論胡淑雯小說〈浮血貓〉中階級、記憶與身體之議題〉，《輔大中研所學刊》第20期(2008年10月)，頁185-201。

陳柏謙，〈挖掘、拼湊歷史過程中遺忘「歷史」的陷阱：一個「白色恐怖」口述史入門工作者的自我意義探求〉，《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03期(2016年6月)，頁191-199。

陳儒修，〈歷史與記憶：從《好男好女》到《超級大國民》〉，《中外文學》25卷5期(1996年5月)，頁47-57。

黃文成，〈土的志與誌——柯旗化火燒島及其獄中書寫經驗〉，《通識研究集刊》第15期(2009年6月)，頁77-95。

劉婉俐，〈神聖與瘋狂：藏傳佛教的「瘋行者」傳統 vs. 傅柯瘋狂病史的權力論述〉，《中外文學》32 卷 10 期（2004 年 3 月），頁 145-171。

歐崇敬，〈「異鄉的存在」與「物化之虛無」的〈山路〉左翼政治思想〉，《思與言》45 卷 3 期（2007 年 9 月），頁 23-56。

（二）學位論文

王建國，〈百年牢騷：台灣政治監獄文學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6 年）。

王珮穎，〈戰後台灣小說的轉型正義實踐〉（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 年）。

史峻，〈臺灣白色恐怖的創傷研究：一個奠基於「族裔反霸權主義敘述」的觀點〉（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沈沛湘，〈從屈從到協商：台灣當代女性小說中的暴力敘事〉（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 年）。

湯舒雯，〈史的暴力，詩的壟斷——台灣白色恐怖的文學見證、癥候閱讀與文化創傷〉（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年）。

三、雜誌文章

呂赫若，〈冬夜〉，《台灣文化》2 卷 1 期（1947 年 2 月 5 日），頁 25-29。

洪明慧，〈寫作是我的勞動方式——訪胡淑雯〉，《幼獅文藝》第 650 期（2008 年 2 月），頁 70-71。

紀大偉，〈資本主義，一個愛的故事——讀胡淑雯《太陽的血是黑的》〉，《印刻文學生活誌》7 卷 12 期（2011 年 8 月），頁 60-63。

張悅然，〈飛躍沒有圍牆的瘋人院〉，《印刻文學生活誌》7 卷 12 期（2011 年 8 月），頁 64-66。

張耀仁，〈跨越界線之謎：訪胡淑雯〉，《印刻文學生活誌》2 卷 8 期（2006 年 4 月），頁 124-128。

黃長玲，〈誠實的騷動與書寫——胡淑雯印象〉，《文訊》第 274 期（2008 年 8 月），頁 41-42。

駱以軍、胡淑雯，〈各式各樣孤獨所形成的暗影——駱以軍、胡淑雯對談〉，《印刻文學生活誌》7 卷 12 期（2011 年 8 月），頁 68-79。

四、電子媒體

國家人權博物館，〈政治受難者張大邦口述歷史〉（來源：https://imedia.culture.tw/channel/nhrm/zh_tw/media/40715，2019 年 4 月 5 日）。

萬仁導演，《超級大國民》（台北：群體娛樂代理，2017 年）。

蔡倩怡，〈胡淑雯：不是傷痕文學〉，（來源：<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e8%83%a1%e6%b7%91%e9%9b%af-%e5%af%ab%e4%bd%9c-%e5%8f%b0%e7%81%a3-7051>，2020 年 6 月 10 日）。